

从“硬”管理到“软”塑造:学科文化助推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的转向研究

杜剑涛 张慕文

[摘要]高职院校开展科技伦理教育有助于促进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以及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长期以来,高职院校存在过分强调管理逻辑而忽视学生人格塑造的现实困境。学科文化从管理逻辑、管理目标和管理重点三方面为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转向提供可能,并在理念维度、内容维度、方法维度和评价维度分别发挥内在功能,使之实现从“硬”管理到“软”塑造的转向,具体路径为:以学科价值文化体系引领教育理念从“小文化”到“大文明”;以学科知识文化体系促进教育内容从“单一化”到“多元化”;以学科行为文化体系促使教育方法从“个体化”到“共同体”;以学科生态文化体系推动教育评价从“低境界”到“高境界”。

[关键词]高职院校;科技伦理;学科文化;文化育人

[作者简介]杜剑涛(1994-),男,广东梅州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张慕文(1991-),男,安徽枞阳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天津 30035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教育部新工科综合改革类项目“新工科人才培养常态监测与质量提升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E-GCJYZL20200801,项目主持人:闫广芬)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02-0027-08

DOI:10.13615/j.cnki.1004-3985.2023.02.015

一、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地位的确认也进一步推动高职院校成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要教育阵地。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职业院校在工作中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修,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技能培养融合统一。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彰显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特征。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有关科技伦理治理规划的指导性文件《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

理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指出“科技伦理是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是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要“将科技伦理教育作为相关专业学科本专科生、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鼓励高等学校开设科技伦理教育相关课程,教育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意识,遵守科技伦理要求”^①,强调高职院校是我国开展科技伦理教育和助推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必要组成部分。

高职院校传统课程体系重视技能培训,忽视人文与伦理熏陶,加上高职院校接触的高科技研究项目较为稀缺,科技伦理教育并不受重视。长期以往,高职院校便以服从管理为目标,

让学生遵守科技伦理规章制度,未能针对学生科技伦理的观念形成和素养内化进行系统化教育设计,造成过分强调管理逻辑而忽视学生人格塑造的现实困境。从文化育人视角来看,学科文化本就具备“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本体功能,既是高职院校软实力的重要表现,也是丰富的育人资源,将其融入科技伦理教育实践中,可以有效为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注入灵魂,推动其从传统管理主义转向人本主义下对学生人格的充分尊重和软性塑造,从知情意行各方面培养具备高科技伦理素养的人才。

二、学科文化助推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的转向可能

(一)学科文化的内涵

展望国内外关于学科文化内涵的研究,典型性观点有托尼·比彻(Tony Becher)在《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中将学科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开创性提出学科文化可以在学科知识本身认识论和学术部落的社会特征两者的互动架构下进行分析。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将学科文化界定为每门学科的知识传统(思想范畴)和相应行为准则,认为各学科领域存在需要新成员养成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崇拜的偶像和外行人难以理解的行话。这种“生活化”的解释获得学界广泛认可。此外,还有不同学者从知识属性、组织属性、管理属性、遗传属性等多个视角对学科文化进行细致研究,不断丰富学科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由于我国学科建设的落脚点和基本单位是院系的学科组织,国内学者普遍将学科文化置于组织框架内研究,认为学科文化的形成归因于学科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孕育出内部成员共有的信仰和价值观,并以文化为内容构成一套管理体系。

统合多种观点,学科文化是一个涵盖学科知识体系、学科组织建设、学科制度、学科群体行为和学科观念等范畴的彰显学科软实力的综合性概念,寓共性与个性、隐性与显性、学术性

与专业性等多重特征于一体,是学科成员在“学科知识与学科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的知识理论体系、学科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学科传统、伦理规范、学科制度与行为习惯等的总和”^②。具体来看,学科文化是包含着学科价值文化、学科知识文化、学科行为文化以及学科生态文化的文化体系,无形中影响并塑造着高校系统内所有个体的品性特质和文化底蕴。

(二)学科文化助推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转向的适切性

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指高校在教学实践中指导学生内心“向善”,帮助学生形成对科学技术的正确伦理观念,逐渐塑造学生的科技伦理意识,从而实现道德自律的动态过程,包括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学方式和教育评价四大环节。学科文化的育人功能从三方面为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转向提供可能。

第一,学科文化有助于高校管理逻辑从约束人到塑造人。传统管理主义下的科技伦理教育以绩效和技术为导向,整体依循管理者的目标,以合理的结构、程序和责任模式为工具理性进行管理,强调管理至上的权力等级,目的是约束和规范学生行为。而《意见》中“推动科技向善、造福人类”则指明科技核心尺度是“善性”,伦理核心尺度是“幸福”。随着高职院校学科成长和育人路径愈发凸显科技与伦理协同共生的内在逻辑,推崇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融合的“第三种文化”成为高职院校帮助学生从科技现象背后的文化层面深度探微科学与伦理的冲突与联系的重要线索。因此,学科文化有助于指导高校在融合科技与人性的文化氛围中实现科技尺度与伦理尺度的统一,推动科技伦理管理逻辑转向对人内在精神和信仰层面的长期塑造。

第二,学科文化有助于高校管理目标从“手段人”到“目标人”。“硬”管理逻辑下高职院校仅将科技伦理教育视为辅助管理的手段,功利地

为了识别、任用能遵守科技伦理规范的学生而进行教育。新时代要求高职院校既要筑牢学生共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又要教育学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学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向善”品格和“担当”精神。前述时代伦理道德的精神内涵都寓于学科文化中,为科技伦理教育不断嵌入国家道德信仰和社会伦理诉求的文化内核,并为教育者树立教学支点和教育分寸,指导他们合理把控教育态度、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逐渐走向人本管理模式与伦理道德与教育分寸的统一,推动科技伦理管理目标迈向培养能创造价值的“目标”人。

第三,学科文化有助于高校管理重点从“器物”管理走向对“人”的关怀。科技伦理教育在高职院校的边缘化很容易使之被窄化为对“器物”的严格管理,如教育目的往往局限在学生能否遵守“器材管理”“实验室管理”等细则。随着高职院校更注重以人为本的管理手段,学校科技伦理工作的管理重点将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每门学科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现代文化和世界文化,可以帮助学生深刻领悟科技发展历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变迁,指引新时代高职教师团队和组织结构在学科文化的熏陶下,产生并传递“共育德行合一的人才为社会服务”的文化精神以及赋予人高尚价值意义的伦理精神,使高职教师摆脱严格训导的形象转为人性导师,指导学生在科技实践中实现文化精神和伦理精神的统一。

三、学科文化助推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的转向维度

(一) 理念维度:以学科价值文化的浸润功能引领教育理念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益,争取在新世纪初使一批高等学校在教育质量和管理方面达到世界较高水平,这使高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

精力集中在质量提升和管理运营方面。处于学历教育较低层次的高职院校往往将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囿于“技术的高端和熟练”,在教育理念上选择性忽视人文素养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影响,模糊了育人调性和深度,导致了教育的“选择性放逐”。长远来看,在国家宏观政策以及新兴技术浪潮的推动下,高职传统专业、新兴专业和交叉专业等都面向国家基础建设和市场需求摆出转型姿态,主动融入人文艺术与关怀,释放高校科研平台和育才平台创新活力,以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现代型高职应用学科已经与未来人类社会形成密切共生关系,偏重管理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科技伦理教育理念显然难以解决人才培养在价值层面的哲学问题,容易被吸入现代科技的负面黑洞、落入扼杀伦理道德的陷阱。

管理主义背后隐含对技术主义快速解决问题的盲目推崇,但这种触及表面的约束式教育始终无法解决人深层次的理念或治理问题。从教育的文明角度出发,学科价值文化正是体现了学科服务“人”的属性以及指导人类改造世界的精神理念,将活动主线置于“尊重人,按照人的方式去对待人”^③的文化象限,使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首先在理念层面聚焦到教育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奠定教育理念的引领地位,从整体上突破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将注重“事后补救”的硬性管理逻辑扭转至重视“未雨绸缪”的柔性育人逻辑,启发教育工作者在文化浸润下回归“创造和铸造人的精神和灵魂”^④的教育理念,深度思考“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这三个基本问题。

从本专业学科背景和价值文化出发,高职院校师生共同审视和学习学科蕴含的伦理观念,有助于增强彼此的契约精神和信任程度。学科价值文化也通过文化浸润功能将共同理念辐射至院校全员,形成全过程、全方位开展科技伦理教育的文化向心力。一方面,学科价值文

化能使成员浸润在“伦理先行”的理念之中,引领育人队伍明确权责和义务,激发他们深度融入为学生提供充分尊重个性发展的科技伦理教育阵营的积极性和使命感,使内部所有成员在长期文化熏陶下形塑着人、自然以及社会的三维立体的和谐共生状态,并在教育双向互动中生成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提升忧患意识和主动破局的能力,进一步抵御外界与科技相关的网络文化、娱乐文化、西方文化等多维度的价值冲击和文化渗透。另一方面,许多高职学生存在忽视科技伦理价值的不足和被动学习科技伦理知识的惰性,学科价值文化能浸润学生心灵深处,唤醒他们主动探讨和分析有关伦理道德的现实科技问题的内生动力,从而端正对科学技术文化态度。

(二)内容维度:以学科知识文化的整合功能夯实教育内容

有学者调研了全国多所理工科高校学生的科技伦理认知现状,结果六成以上学生赞同“科学研究无禁区”^⑤。2020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开展第十一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着重对公民科学“知识”和“能力”进行抽样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虽已达10.56%,接近欧美国家平均水平,但区域人群素养尚不均衡、科技伦理知识教育任重道远,皆表明我国高校学生科技伦理知识厚度不足。此问题同样存在于高职院校内,究其原因,一是高校为学生搭建的科技知识框架缺少传统文化、人文素养和实践伦理等内容的合理补充,甚至与国际最新科技发展与伦理要求“脱轨”。二是高校主要依托“思想政治道德修养与法治”等公共必修课为学生输送单薄贫瘠的科技伦理知识,提供浅表的知识解读,缺乏具有典型教育意义和行业公认的精品教材和课程。三是不同学科课程开放性不足,不利于学生进行跨专业知识学习与跨文化交叉融合,加筑不同学科间的知识藩篱和文化边界,种种现实桎梏难以支撑起

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的宏大知识体系。

在管理语境下,高职院校甄选科技伦理知识以权威的政策文件、专业规章制度和行业标准等为代表。但在育人语境下,科技伦理知识体系要求反映高素质技能人才应具有的核心知识素养,包括能塑造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传统伦理文化知识、专业理论和操作技术知识以及伦理规范知识。学科知识文化育人就体现在各专业的科学理论、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知识体系及其背后知识文化与人的观念的相互渗透。随着现代学科知识型规则将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严格区分,知识走向碎片化发展,学科知识文化有利于高职院校整合有用知识以及探索如何正当利用知识,不断夯实教育内容在科技伦理教育中的基石作用。

正如兹纳涅茨基(Florian Witold Znaniecki)认为知识是社会角色的先决条件,人们的思维方式、情感归属和内在信仰等往往因不同知识类属形成特定圈层,学科知识文化整合着科技工作者们的知识生产和知识转化行动,形成特定文化群体。一方面,学科知识文化有助于为学生整合每门学科的知识演变脉络、历史发展规律和伦理精神嬗变,促使学生对本专业知识体系内含的思想精神和文化内涵产生生产思维特性,从而在从事技术生产和知识理论创新工作时能融入紧跟时代理念、技术和思维的专业知识以及具有人文气息的通识知识,以多元学术视域在以应用为取向的社会环境中生产出为全人类谋福祉的科技知识。另一方面,学科知识文化作为多种知识大浪淘沙后的文化“加工品”,具备多种学科文化的文化共性和育人逻辑,有利于整合学生科技转化的行动理性,帮助师生在跨学科学习合作中快速整合对方的文化领地和语境,使之在参与科研项目和技术成果转化中保持“求用”与“求真”统一的文化态度,养成独特学科文化的行为模式和遵循伦理

规范的专业习性。

(三)方法维度:以学科行为文化的规训功能创新教育方法

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高等职业学校要结合专业分类和课程设置情况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深入挖掘各类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当教学陷入形式化和模式化时,教育主体可能会背离塑造学生人格的使命与责任,陷入僵化管理格局。作为学校里规范文化的展现,成员们的学科行为文化在教学层面可具现为两方面:一是内部成员围绕教学活动形成稳定的行为规范;二是具有教学意义和功能的各种校内外活动。诚然,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学方式仍有巨大提升空间:第一,以管理为目的传统课堂教学缺乏文化引领和教育情怀,教师教学行为卸下了伦理教学的责任,未能较好实现全面育人。第二,教学方式的俗套与窠臼将直接降低师生对科技伦理的道德内化和行为外显能力,使教学理念和行动呈现出“两张皮”的“孤岛”样态。合作教学、项目式教学、微课堂等新颖教学法在高职科技伦理课堂甚为罕见。第三,欠缺有深度、厚度和温度的科技伦理讲座、培训、竞赛和校园文化活动,传统教学使学生对涉足其他学科的最新科技成果和应用伦理文化产生迷惑和抗拒心理,加固了以专业为壁垒的文化休克和文化屏障。

管理至上的目的是制造服从,一些高校将科技伦理教育窄化为简单的口训教导、强硬的制度约束或者形式化的考核,保证学生不逾越常规制度“底线”,实则无法教导学生面对复杂伦理问题。而教育的目的是促进认同,新公共管理理念下大学意识包含私营经济部门的技术、实践和价值观,也指大学如何运行这些技术和实践,即高职院校需要教会学生如何运用技术而非知晓技术。在此过程中,师生在科技活动中展现出的伦理行为会深受该领域制定的契

约以及维系该契约稳固程度的群体力量影响,产生具有正向功能的学科行为文化,形成内部拉力规训内部成员共享信念和文化,酝酿出在科技伦理教学中制造并传播学科文化的群体意识,营造教师“乐教”、学生“乐学”的良好教学氛围,建构彼此认同的操作规范、伦理界限以及群体准则。

学科行为文化还在于化个人意识于集体意识之中,以道德和价值力量发挥文化规训功能驱动教师创新教学方式。第一,学科行为文化有利于不断强化其所在学科的群体文化样态,规训教学行为走向法制化和治理化,形成政府统筹管理、行业企业举办以及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科技伦理教学的多元格局。第二,学科行为文化有助于规训师生对科技伦理教学必要性的文化认同,激发教师在学生论文选题、实习培训、实验操作、技术操练和科技研发等环节采用多种具有文化深度的教学方式,加强对学生科技工作和自主伦理决策的行为导航。第三,学科行为文化能通过多样化教学形成规训力量,既能促进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教师对自己的专业文化形成独到见解或者潜在行动规则,又能以一种正常的规范化权力雕琢着学生行动逻辑的意识基础,使教师通过熏陶、暗示和渗透与学生共享科技伦理文化真谛。

(四)评价维度:以学科生态文化的导向功能变革教育评价

管理主义引导下,科技伦理教育评价的目标被简单的绩效考核取代了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人格塑造,招致诸多现实局限:第一,偏重效率提升和成果产出的评价文化引发的竞争文化会加剧教师将重心放在项目资源等的常态争夺,忽视学术生态对学生伦理意识养成的隐性功用,弱化学生的过程性教育诉求以及不同个体对道德认知思维差距的重要性。第二,高职院校以危机管理意识对待科技伦理教育的观念漠视了对学生创新意识、主体意识、责任意识、

诚信精神、批判性思维等指标的系统考察,异化出重结果轻过程的考试文化。第三,高职院校科技伦理评价尚未建立健全制度和体制机制,如影响评价文化的科技伦理委员会大多只是围绕短时项目迅速集聚,暴露出时效性短、功能性弱、辐射范围窄和功能不健全等弊端,院系层面也未能完全调动社会多主体参与共同评价和监督的积极性,反映在学科生态层面就是将高校发展置于学生发展之上,难以形成有益于科技伦理教育评价和高素质人才评价的文化共识。

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最后一公里”就是如何准确评价学生学习效果,以真实具体的数据指导教育评价不断改进。随着科技伦理日渐从对科学技术的使用规范与道德约束延展到探析科技与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深层关系,学生的科技印象和伦理道德往往需要在心理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各种复杂关系中双向建构,评价学生科技伦理素养就要考察其所在文化场域的学科生态。稳定的“以人为本”的学科生态文化可以发挥强大导向功能,为学术梯队传播学科伦理精神提供成长平台和空间,为院系组织生成以“提升人才素养质量为中心”的教育评价转向提供动力,使高校在教育资源输入和绩效输出的不断循环与再生中发挥教育评价的调节功能,使学科生态文化不断影响并优化着资源流通、组织建设、制度规范和人才评价等方面的变革。

具言之,第一,良好学科生态文化能形成“有序”育人氛围,助力高职院校内部协调成果产权归属、学术道德规范、资源共享等现实问题。如此,教育者就能形成文化合力将更多精力倾注到对学生全方位的评价考核。第二,近年来频发的高校实验室伦理事故和学术不端事件反映了负面学科生态文化会使评价尺度淡化对学生伦理素养的考察,降低学生对科技伦理的形象塑造和文化认同,良好学科生态文化必定能使教育工作者将学生能力发展和生命价值

奉为评价圭臬。第三,良好学科生态文化能引导高职院校创建多维度、多学科、多过程的指标体系,形成“葆有学生稳定伦理情感,实现技术应用中的伦理内化和文化代际传递”的考试和评价文化,间接涵育校园文化,形成塑造学生伦理规范和行径的力量。

四、学科文化助推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的转向路径

(一)理念转向:以学科价值文化体系引领教育理念从“小文化”到“大文明”

第一,高职院校要组建党委委员会专门研讨科技伦理教育的工作精神,成立专业科技伦理委员会作为牵头部门,发挥领导者的文化引领作用,做好科技伦理教育的顶层设计并弘扬学科价值文化。管理者要弱化“纯管理”思维,强化“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思想导航和文化育人的重要论述,以学科价值文化立好科技伦理教育的“风向标”——教育出具有崇高理想信念、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正确的价值研判和心怀天下的品格气质的高素质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人才培养目标高度提升为知识传授、人格塑造和能力培训三位一体。

第二,高职院校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对标三全育人的精神导向,将科技“向善”理念通过学科价值文化浸透到每个个体的意念中。一方面,要在学生管理制度、学业预警机制和毕业考核制度中融入人文内容,为学生植入善用科技的种子、树下科技伦理的规则、升起科技伦理的底线。另一方面,完善职业教育教师资格认定制度,促进师德师风建设,遴选出具有文化感召力和高学术品性的榜样教师发挥模范先锋作用,塑造学生对学科价值和科技伦理的文化认知。

第三,高职院校要通过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结合的方式弘扬学科价值文化,筑牢教育者教育理念和塑造学生文化精神。学习方面,通

通过开展与学科文化和伦理道德有关的讲座和培训等形式,不断强化高校内部人员对所在学科的文化忠诚和对科技伦理的理念认同,设计出培养“文明人”的多元方案。生活方面,通过网络媒介、社交平台、横幅口号、学校官方网站和校内宣传栏目等多种渠道,调动全校师生文化热情生成“创新、科学、开放、服务、绿色”的教育新理念,将科技伦理教育从培育学科“小文化”提振到共建科技“大文明”的高度。

(二)内容转向:以学科知识文化体系促进教育内容从“单一化”到“多元化”

第一,高职院校要对接新经济、新技术、新职业以及学科建设文化内涵,结合院校发展优势与特色,绘好塑造学生科技伦理知识的“路线图”——将文史哲经典以及“批判性思维”“科技文明发展史”“科技伦理学”“工程伦理学”等纳入学生通识课程,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中增添科技伦理道德、创新创业道德等知识比重,挖掘课程背后的国家文化、行业情境、文化氛围和历史脉络等提升知识的人文性和时代性,通过真实实践课程弘扬劳动教育和拼搏进取的文化,使学生增强对工程技术、学术研究等的创新精神和文化认同,最终在多元化课程体系构建学科知识文化。

第二,高职院校要集结一批专业理论型教师和一线技术型教师,以多学科知识和文化视角共同设计科技伦理“金课”。如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专业就由拥有计算机、哲学和政治背景的几位教授共同从各自学科的文化背景考量技术伦理走向,设置“计算机、伦理与社会责任”作为核心必修课并取得积极成效。同时要共编融合中国科技发展和文化立场的本土教材,既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又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要在专业领域引入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标准、新业态,增加常见的学术不端和违背伦理的现实典型案例,帮助学生在多样化的知识体系中汲取知识

文化的力量,规范自身伦理行为。

第三,高职院校要积极与相关科技协会与组织、其他高等院校、政府和行业企业等共筑知识文化体系,完善以服务社会发展为导向的标准化科技伦理知识体系,并通过提升国内高等职业教育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和学术声望,积极刊发中国科技伦理的前沿知识和科技成果转化正面伦理文化,鼓励学生积极创作可供公开发行的、大众喜闻乐见的宣传科技精神与伦理文化的优秀现实作品或网络文化作品,使学生统一课堂学习和生活实践,不断延展科技伦理知识内容,开阔文化眼界。

(三)方法转向:以学科行为文化体系促使教育方法从“个体化”到“共同体”

第一,高职院校要培养或邀请一批文化功底深厚的名家大师,建立长效性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为教学实践廓清伦理边界,预估和防范不科学的教学方式和行为可能触发的伦理风险,形成稳固的教学共同体的行为文化,共同监督科技伦理教学实施和方法变革。在共同体行为文化引导下,高职院校要丰富科技伦理教学方式设计。高校要形成以“热门科技伦理问题”为导学线索,以专业课程为主要教学阵地,以实践操练和文化熏陶为第二课堂教学的三方联动,打造“前沿学科领域课程+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互联网+科技教育+思政教育”“专业知识+伦理通识+应用伦理”的融合创新。

第二,高职院校要积极建立与社会相关利益主体的联系,打造协同育人机制,丰富科技伦理教学方式,共建教学共同体规范学者教学行为和学生学习行为,稳固群体文化认同。换言之,高校要与校外产业科研院所和企业行业加强深度合作,把科技伦理教育课堂转移至一线实践中,使学生发现、应用并内化科技伦理知识,塑造伦理精神。如江西省提出要探索建立区域性、行业性科技伦理审查中心,江苏省提出要推动涉及科技伦理敏感领域的各类创新主体

设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这些都是共同体共育人才的有利途径。

第三,高职院校要充分发挥学科资源和平台优势,探索本研贯通科技伦理教学设计,加强跨院、跨系和跨国际项目交流,积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或地区组织开展深度合作,鼓励学生用中国文化意蕴解决科技伦理前沿问题和重大科技创新项目,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仿真等技术参与技术研发及成功转化项目,提升科技伦理教学成效。在稳定的学科行为文化内,增强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伦理理解能力,建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遵守科技伦理行为规范的新时代人才队伍。

(四)评价转向:以学科生态文化体系推动教育评价从“低境界”到“高境界”

第一,高职院校要遵循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精神,革新原有“低境界”评价理念,转向以人为本的重视教育成效和品性塑造的“高境界”学科生态文化。国家和高校要加强科技伦理治理能力,要系统设计评价体系,生成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维持内部持续优化的组织文化。同时,设立相关政策法规、教师教学激励机制约束师生科技伦理行径,鼓励高职院校从科研管理、要素投入、组织建设和考核评价等多方面支持并保障跨学科的科技伦理合作以及教学活动秩序。

第二,高职院校要将技术创新和立德树人的理念融入科技伦理评价。一方面,评价载体要多样化,鼓励高职院校开展科技伦理社团建设、相关竞赛、文化节庆活动和研讨会等,为学生定制人文素养记录单。另一方面,评价方式要规范化。高职院校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的相关要求,建立科研管理、审查、评估机制和质量监管体系,完善监管程序和帮扶措施,修订和完善通用认证标准中的人才培养要求和毕业要求制度,通过各级各类教学指导委员会或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等专家组织,营造法治化的学科生态重塑高职

院校人才质量评价观。

第三,高职院校要淡化标准化考试权重,将社会新需求、企业新技术、行业新思维融入人才评价方案,从价值抽象力、文化洞察力、社会责任心、学术规范性、复杂性思维和创造性意识等多个指标评价人才素质与能力,培育反映国家与党的意志的先进科技伦理考试文化。同时,以多主体参与的思路打通教师评教、学生评教、教师评学的壁垒,形成“教师愿教敢教、学生愿评敢评”的学科生态。要对毕业学生的科技伦理、创新思维、家国情怀等展开长期追踪评估,使高校科技伦理教育评价贯穿学生培养全过程,迈向“高境界”的文化维度。■

[注释]

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Z].2022-03-20.

②肖楠,杨连生.大学学科文化及其“生成—演化”机制[J].中国高教研究,2010(12):21.

③李建国.文化育人的哲学省思[J].高等教育研究,2014(4):10.

④戴开成.新时代习近平文化育人系统思维研究[J].系统科学学报,2022(2):85.

⑤光明日报.为科技发展种下向善的种子[EB/OL](2022-05-11)[2022-11-02].<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2532853860321906&wfr=spider&for=pc>.

[参考文献]

[1]陈锡坚.重视学科文化建设提升大学核心竞争力[J].中国高教研究,2008(8):47-49.

[2]耿乐乐,李悦.现代大学治理:从管理主义向领导主义理念的转变[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1,41(21):7-10.

[3]祁亚辉.从科学管理到人本管理——兼论人本主义在管理理论发展中的地位[J].社会科学论坛,2005(2):23-27.

[4]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1-1997)[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栏目编辑:黄晶晶 刘杰 袁慧)